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上海民众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形成

杨丽萍

内容提要 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权的稳固不仅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维系,还必须仰赖一系列合法性资源的拱卫,其中包括幸福观念。上海解放后,当政权建设的紧迫性遭遇百废待兴,中共不得不另辟蹊径,挖掘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以快速获得政治认同,对市民的幸福观改造就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幸福观的形成和固化无法依赖于单纯的意识改造,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幸福观的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幸福感 整合

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06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6.02.026

在现代政治中,幸福观构成了政治合法性资源中重要组成部分。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决定着人们的幸福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上海成为中共执政的试金石。随着过渡性的军事管制结束,新政权的巩固依更有赖于政治绩效等物质基础。而当政权建设的紧迫性遭遇百废待兴,中共不得不另辟蹊径,挖掘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对市民的幸福观改造就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幸福观的形成和固化无法依赖于单纯的意识改造,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幸福观的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

一、上海市民幸福观众生相

1949年5月的上海解放,分水岭意义表现在社会的诸多显性层面。按照标题关键词“幸福”来检索,《文汇报》自创刊以来到1957年为止。含有“幸福”一词标题的新闻资讯共计537篇,而其中上海解放后的就有471篇。《新民晚报》自创刊以来刊登以“幸福”为标题的文章291篇,其中属于解放后的274篇^[1]。特别是社会稳定,经济恢复之后,“‘幸福’真像长了翅膀似的到处飞。人们嘴里说着它,心里感觉到它,无线电和报纸传播着它”^[2]。“幸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和热门话题,陈庭梅指出:

[1]根据《文汇报》、《新民晚报》图书数据光盘检索。

[2]王维堤:《谈幸福》,〔上海〕《文汇报》1954年10月6日,第6版。

“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宣传材料里,幸福和美好生活都是经常出现的概念。”^[1]

不仅数量上相差悬殊,作为文本抑或意识的“幸福”主题前后也迥异。在为数不多的解放前的幸福话题探讨中,绝大多数内容是围绕夫妻生活幸福展开的;而解放后有关幸福的探讨上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仅以报纸而言,相关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类是介绍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生活;第二类,对幸福真谛的探讨;第三类,关于上海市民幸福生活的报道。正是通过这些文本资讯,本文得以管窥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市民有关幸福的真实看法。

一个受访的中学生被问及:“你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是怎么样的?”他楞了一下说:“一早起再不要扫地生煤炉了,放学回家来不要领小妹了,还有每星期天能看一场五彩的早场电影。”成人们对幸福的要求则更加现实,但无论长幼,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么,家里有电视机、电冰箱;孩子都送到托儿所去了;春夏两季有假期旅行和公费休养,同爱人一起上庐山或北戴河;每天只要做有限的几个小时的工作,而且一切都机械化自动化了,省力又不费脑筋……。”^[2]这些朴素而务实的幸福观正是当时社会成员内心真实而直白的表达。

由此可见,在社会和文化层面,1949年的解放并未表现出与过去彻底的断裂,至少,在生活领域,物质主义取向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历史惯性,物质的满足度依然是幸福体验中的基础性因素。上海历来是全国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高的区域。开埠后,西方的消费主义理念深入民众,人们在吃穿方面不仅追求着品质,且将其与时尚、时髦结合在一起。例如,对于服装的讲究,“在过去的上海社会里,‘行头’”“控制着99%的上海人的神经,他们为它而困扰,而痛苦”^[3]。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笑贫不笑娼”也变得理所当然。

经历了魔都消费主义理念洗礼后的上海人,在解放后的最初岁月里,对幸福的理解很难脱“俗”。“很多人把‘幸福生活’只理解为享受:穿得好,吃得好,住得舒服”^[4]。稍有文化和追求的年轻人对幸福的认知中,除了物质充裕之外,增加了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对他们而言,“什么是幸福呢?当一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爱情某一方面的心愿得到满足时,他将认为得到了幸福”^[5]。文化水平层次更高的社会成员对幸福的追求,虽超脱了纯粹的物质追求,却无法彻底摆脱物欲的羁绊。“有的人觉得这样不够,还应该有好电影和音乐,还应该有好内容充实的书籍……。”^[6]

正如“君子忧道不忧贫”尽管难以实现却是封建社会推崇备至的幸福道德一般,上述这些淳朴的幸福观虽具有普遍性,却不符合奉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中共的理想追求。

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幸福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虽承认个人幸福,但也以劳动、爱国、奉献等理性主义幸福道德追求为精神旨归。“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幸福的人。”^[7]

在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形成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共有的革命历史记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

[1][加拿大]陈庭梅:《苏联电影的引进及其对塑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意义(1949-1976)》,韩长青、朱倩译,〔上海〕《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4]乃凡:《“幸福生活”还是“享福生活”?》,〔上海〕《文汇报》1954年1月20日,第6版。

[3]《翻行头观念改变,金钱豹身价大减》,〔上海〕《新民晚报》1949年12月25日。

[5]宋捷文:《最大的幸福》,〔上海〕《新民晚报》1954年9月29日,第2版。

[6]叶觉:《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上海〕《文汇报》1954年1月23日,第6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用。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文学传记、影剧作品在中共文化与教育经历中占据重要地位。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真正的友谊、爱情、青春,——这一切就是让人能成为幸福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卓娅在她临死之前说道:“不要哀悼我!为自己的人民而死!——是幸福的!”^[1]随着这些革命英雄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幸福观超出了单纯的精神激励范畴,而是符号化为中共的政治意识和观念根植于中共精神深处。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成型还与其特殊而艰苦的革命生涯分不开。作为起义出身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都难以摆脱物资资源匮乏这一痼疾,幸福观无法建立在物质追求之上。“供给制”所能保障的仅仅是基本生存需要,大生产运动能解决的也仅仅是粮荒。如何令千万革命追随者们在清贫和艰苦的革命生涯中感受幸福,坚守理想和信念,成为中共壮大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幸福观出炉。这一幸福观虽不否认人的物质幸福,但却将幸福与劳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结在一起,将享受和劳动统一起来,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统一起来。

生存和发展环境的迥异,使得中共与上海市民的幸福观不可避免存在认知差异。上海接管后,中共仅有区区一万人的接管队伍,而其所统合的对象却足有500万之众。不仅如此,建国前后,在多重危机冲击之下,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949年6月,上海开工的厂家不足三分之一,即使勉强得以维持,其产量也远远低于平均量。工人失业、物资供应紧张使得民众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建筑在物质满足度之上的幸福感受难有积极反映。而作为新生革命政权,赢得政治认同是政权稳定的前提。幸福观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展开的。

二、上海市民幸福观的变迁

幸福感归根结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受到个体认知水平、价值观念、人生取向、生活态度以及所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建国后上海市民全新的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形成,不仅来源于一系列观念和意识的塑造、行为的规训,更离不开新观念所处的人文与物化环境的固化。

1. 民众幸福观念、意识的改造和重塑。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承继于马克思主义,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共有的想象和历史记忆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革命实践孕育而成。这种幸福观从理论上固然承认个人的物质幸福,但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却表现出明显了禁欲主义色彩,沉浸在消费主义大都市中的上海市民,其幸福取向显然与此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幸福观改造对于上海市民群体的要求固然不同于军队和党员干部群体,但也表现出浓郁的道德诉求。

举措一:引介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生活样板。在政权更迭期间,社会制度尚未稳固,经济尚未恢复,缺乏制度自信的中共,引介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模式,并将其打造为幸福样板,引导上海市民转向对社会主义幸福的追求。早在1949年解放当年,《文汇报》就刊登了此类新闻。转入1950年后,这类文章大量且持续化地刊出。例如:《光荣幸福永远属于她们,苏联姐妹的生活和工作,伟大的图片展览正是一个写照》(《新民晚报》1950年4月20日,第2版);《幸福的增涨》(《文汇报》1951年3月9日,第2版);《经建成就带来幸福波捷等国人民生活日益提高》(《文汇报》1951年3月17日,第2版);《苏联的新家庭,互助互励的幸福生活》(《新民晚报》1951年7月26日,第3版);《从数字看苏联人民的幸福》(《新民晚报》1951年11月17日,第3版);《世界上最幸福的苏联儿童》(《文汇报》1953年5月30日,第2版);中原:《幸福光芒照耀到每一个家庭——记捷克斯洛伐克展览会的家庭用品馆》(《新民晚报》1955年10月23日,第4版)。其中,《幸福的增涨》主要介绍匈牙利、波兰两个人民民主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苏联儿童》则介绍儿童的幸福生活,文

[1]王维堤:《谈幸福》,〔上海〕《文汇报》1954年10月6日,第6版。

中这样记载：“在苏联，儿童受到共产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童年。”^[1]

除了报刊，广播、书籍等大众媒体，电影、戏剧等大众娱乐也各自发挥其优势，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叙事框架的同时，勾勒出新社会关于幸福的图景。

电影是更加直观的展示平台。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仅苏联影片就进口了468部，其中9部影片观影人次超过了2500万^[2]。加拿大学者陈庭梅认为：在1950年代，中国城乡公民的生活体验包括了像“电影这样的大众传播新手段，将苏联建设成就、机械化和高歌猛进拔高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而在日常生活中，国家主义体现在交流、传播的物质条件以及苏联技术融入中国土地的过程，并且体现在虽无基础但同样真实可见的社会主义全球想象”^[3]。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影片即《幸福的生活》。尽管这部影片侧重于讴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所塑造的社会主义幸福，但影剧形式将集体化、工业化等未来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模式中的核心要素被链接起来，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幸福直观而形象起来。

由此，通过密集而深入地引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以及由此传递出的制度优越性堆积塑造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模式。在此情境下，幸福与社会主义被紧密链接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劳动、集体化和工业化构成了幸福追求的要素。正如文章作者所言：“创造这种生活的劳动的本身，也是一种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对我们讲来应该是更重要的。”^[4]而“资产阶级以‘不劳而获’为‘幸福’，我们则认为是一种耻辱；资产阶级以‘劳动创造’为苦事，我们则把‘劳动创造’看作是最大的幸福！”^[5]

举措二：对幸福观进行全新的诠释。世俗幸福观念感性而务实甚至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大多建筑在趋乐避苦的物质主义基础之上，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背道而驰。在对社会主义幸福观念的打造过程中，除了引介苏东社会主义样板之外，新政府也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诠释社会主义中国的幸福含义。

如果说报纸和电影等新兴大众媒介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幸福生活的引介，将社会主义的幸福观通过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城市工业化演绎进日常生活情境的话，那么有关幸福的讨论则将劳动在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过程中的必要性、崇高性表达出来，完构了幸福与劳动，幸福与集体主义，幸福与社会主义有机统一。“健康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很好的工作；未婚的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继续深造；结婚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有一个和睦互助的家庭；多子女的父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了希望。然而这一切，都将因为和社会的结合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工作，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奠基；学习，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办事；美满的家庭将给生产以鼓舞；众多的子女将给国家以更多的瑰宝。脱离了这些，幸福又将体会着什么？”^[6]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强调人的精神幸福，但不否定物质幸福。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物质匮乏以及工业化的积累需要，幸福观的改造中显示出明显的去物质倾向。“只有这样一种人：他积极地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伟大的祖国建设工作上，而忘却了自己个人生活的琐事，忘记自己的不幸，那么，这种人就是最幸福的人。”^[7]在这里，劳动等本身的物质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的超然性所覆盖，热爱劳动于是被等同于努力追求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从而使得参与劳动，追求集体主义成为获得幸福的渠道，幸福观弱化了物质追求。

[1]《世界上最幸福的苏联儿童》，〔上海〕《文汇报》1953年5月30日，第2版。

[2]颜纯钧：《中国电影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3]〔加拿大〕陈庭梅：《苏联电影的引进及其对塑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意义（1949-1976）》，韩长青、朱倩译，〔上海〕《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叶觉：《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上海〕《文汇报》1954年1月23日，第6版。

[5]〔7〕文艾：《谁最幸福》，〔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4月22日，第3版。

[6]华湜：《幸福》，〔上海〕《新民晚报》1954年7月7日，第6版。

幸福观去物质化过程中,人们对于日常生活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一方面,爱国奉献,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传统视域下幸福的悖论成为全新幸福感之源泉或容器。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在社会生活中不为人所关注,甚至原本细枝末节的事物都具备了承载幸福的特质。“过去学校里的文体体育用具远不能满足同学需要,比如篮排球仅各有一只,可是现在一切球类齐备了。再如厕所不清洁,教室不标准等的现象都已得到改善,并且又添了新的桌凳和教育用具。我们同学都很幸福、愉快的学习着,我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1]

举措三,通过意识整合来重塑幸福观。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时间里,经济恢复以及国家建设的多重使命,使得中共难以逾越幸福感的物质依赖性这一障碍。这导致:一方面,具有较高社会主义道德色彩的幸福观念难以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观念与意识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异化问题。与此同时,政权合法性建设却是中共政权稳固的既定诉求。因此,观念的固化就有赖于强有力的意识整合。诉苦、对比和营造翻身感是中共革命时期主要的意识整合方式,这些方法也被用来开展幸福观的重塑。

例如,1952年4月17日的《文汇报》刊出题为《国际保卫儿童大会继续举行会议,松本报告日本儿童生活惨状》的通讯:“日本去年有三十万儿童被贩卖,雇用童工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儿童进不了学校,人民差不多没有得到医疗帮助。……日本儿童吃得很坏,缺乏衣服和鞋袜,而且还被迫给在朝鲜受伤的美国士兵输血。”^[2]这篇报道反映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已无从考证了,但它给读者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此时中国儿童的物质生活也不宽裕,但其在生活在和平稳定环境中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相比较诉苦和对比等宣传策略,翻身感则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下体系化的意识整合方式^[3]。具体而言,翻身就是通过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特别是赋予下层民众以政治民主权利,快速打破社会底层成员的原有社会分级。这种社会位置和存在方式骤变的翻身体验必然带来愉悦、幸福等积极情绪反应。笔者问受访者周大爷:“上海解放的时候什么心情?”回答:“开心!穷人翻身了!当家作主了!50年代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了,我们听共产党的话。在农村,不知道共产党的存在,解放了,才知道共产党,参加了工会。”^[4]另一位受访者朱大爷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问:“觉得(解放后)过得幸福吗?”回答:“解放以后生活开心啊!有一种翻身感,做工作认真,不计较报酬。夜班值班,没有钱,给点儿粮票也觉得很开心。”^[5]这两位受访者所表达“翻身”,显然是一种符号化了的红色话语,两位受访者本身有无具体翻身的实际变化已经不重要的,意识整合的结果使翻身这一革命话融入社会生活,构成了那个时代富有革命色彩的幸福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翻身是一种体系化的意识整合,其所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甚至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幸福体验。如下列访谈所示:

笔者:那您感觉是50年代的幸福感更强,还是现在的幸福感更强?

周奶奶:现在的幸福感强,当时50年代是翻身感强,好像就是不受人家欺负了,拿钱能买到东西了。

笔者:解放前您主要是受谁的欺负呢?

周奶奶:没有人欺负,但在当时像我父亲蹬三轮车,失业的人多。白天没有人搭的,基本上都是晚上搭。

[1]王杏根、姚久龙:《同学们欢度节日歌颂幸福的生活》,〔上海〕《文汇报》1952年10月6日,第3版。

[2]《国际保卫儿童大会继续举行会议,松本报告日本儿童生活惨状》,〔上海〕《文汇报》1952年4月17日,第4版。

[3]杨丽萍:《试论建国初期上海市民的翻身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周大爷:92岁,苏州人,工作:黄浦区百货公司新世界,做丝织品。

[5]朱大爷85岁,崇明,解放前在崇明务农,解放时在上海做学徒工。

资料来源:周奶奶,81岁,解放前没有工作,也没有读过书,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如上文所示,解放前后,受访者周奶奶的人生境遇发生明显改变,读了书,有了工作。这些变化给她带来了翻身感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体验,她甚至赋予翻身以全能性。例如,周奶奶表示翻身就是没人欺负了,但当笔者问她解放前被谁欺负,她却无从回答。

通过一系列意识和观念的改造和重塑,旧的幸福观开始瓦解,而新的幸福观开始形成。然而,正如翻身这种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固然能够引起底层市民生存方式倒置的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物质支撑也难以持久一样,观念改造、重塑的成果需要固化,这依赖于更多配套性工程。

2. 行为的规训。当幸福观弱化了物质化取向,以及表现为通过劳动和奉献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价值追求时,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塑造就基本成型了。但是,作为一种意识,要上升为社会意识并最终固化,于此相关的行为规训就不可或缺。

首先,俭朴生活习惯的养成。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消费市场的畸形繁荣。解放后,常年艰苦的军旅生涯使得解放军不仅在穿着,且在饮食上继续保持节俭作风。这一革命传统不经意间与解放初期上海因物资匮乏而清苦的生活现实相互切合,由此催生了压倒性的简约生活消费风气。1949年5月,大批的解放军、干部开始进城。进城的军人、干部多穿灰色的军服和中山装,上海青年学生纷纷仿效,穿起自认为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制服装,此风迅速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一些人甚至将长袍、西服改做成中山装或军服。“这个秋天,人民再也不用为‘虚有其表’的秋装发愁了,整个的社会风气已由奢入简,可以有什么穿什么了,最多只要买一件蓝布衣服就足够应付了。”^[1]制服装很快席卷了全城市,其普及度之高令人咋舌,甚至家境殷实者也出于种种原因穿上了制服装。“金钱豹”(皮草服装)兴“灰背”一时成为点缀橱窗的装饰品了,而在过去,一件“灰背”要值黄金六两,上品的可以卖到一根大条。只有大众化的货色,“去路”才广^[2]。原本追求时尚的行为,不期然发展为简朴的生活风气,这种由奢入简的风尚迅速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接管才不过三四个月,人们的日常饮食消费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菜场蔬菜的销售情况来看,小菜如萝卜、白菜、豆腐、云(芸)豆、蚕豆、冬瓜、炸豆腐主顾特别多,生意繁忙。肉、鱼、蟹、鸡虽然仍有买者,但为数已很少。“肉是一斤半斤,鱼是一条二条,蟹鸡问津者不多。”“美国洋酒、罐头更无人过问,伙计在柜台里无聊的在干打算盘”,“数千元玻璃盒水果,大公司一天也卖不了几盒。”^[3]西菜咖啡店有不少歇业,大中型酒楼、菜馆难于维持。在1950年中,就有31户因资本家缺乏经营信心而弃店出走,有86户关店歇业,其中有南华、金门、万寿山、大中华酒菜馆等名店大户。另据1954年统计,在947户酒菜馆中经营亏损的达378户,占40%^[4]。其他诸如高档化妆品、理发馆以及宾馆都出现了类似情形,酒吧、舞厅、夜总会等被取缔,奢侈性甚至享受性消费日趋没落。

这种状况并未随着经济的恢复而转变,反而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化。高积累、低消费的国家发展战略使得高档消费消失的同时,市民日常消费体现出较高的大众化和平均化趋势。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之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日趋同一。体现在穿着方面则是制服装大行其道,不仅款式趋同,材质和色彩也无甚区别。“无论是男也好,女也好,老教师也好,青年教师也好,大家全是蓝色、灰色的人民装。走进学校的办公室,一眼望去只见一片蓝灰色。”^[5]

最终,有意无意间,节俭都上升为意识形态高度的社会品德。即使在支付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之

[1]《蓝布衣裳足够应付,今年秋装不必再愁》,〔上海〕《新民晚报》1949年9月19日。

[2]《不要为了学时髦来穿列宁装》,〔上海〕《文汇报》1951年6月23日。

[3]《庆祝开国佳节又到,欢乐气氛弥漫全市:小菜场熙熙攘攘贵族化的礼品今年生意可不好》,〔上海〕《新民晚报》1949年10月5日。

[4]《上海饮食服务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饮食服务业志》,上海新闻出版局2006年版,第49页。

[5]《和女教师谈谈服装问题》,〔上海〕《文汇报》1955年7月7日。

内,人们也宁可选择节俭的生活方式。就以服装而言,“难道说爱美的上海人真的不愿意穿得漂亮一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是不想穿,而是不能穿’”^[1]。

其次,勤劳品行的养成。在社会主义幸福观语境下,劳动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经之路,劳动的崇高性被最大化地突出。因此,无论是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新政府都刻意强化人们的劳动意识和行为。中共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勤劳品性的规训更是不遗余力。伴随着城市社会的重组,组织劳动成为组织化的重要使命,有组织的卫生运动就是其典型代表。在1949年底的清洁运动中,新政府发动群众18万人次,清除垃圾、渣土污泥9000余吨,整治环境3000余处^[2]。此后,卫生运动发展为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声势浩大。借此不仅整顿了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养成人们勤劳、卫生意识和品行。例如,在1952年的卫生运动中提出了“八净”(孩子、身体、室内、院子、街道、厨房、厕所、牲畜圈都要干净)、“五灭”(灭蝇、蚊、虱、蚤、臭虫)、“一捕”(捕鼠)的要求和口号^[3]。在1953年2月的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中,全市“以勤洗衣服,勤洗澡,不喝生水,不吃生菜,不随地吐痰”为宣传内容,共清理普通垃圾68682548吨^[4]。

个体的勤劳意识和行为养成并非终极目标,新政府着力改造的是整个城市精神。在整个1950年代,上海经历了一场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的改造。这是因为,在对上海的前期认识以及后期调查中,中共都认为上海是一个“消费性”而非“生产性”城市,“旧中国的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消费性的行业,尤其是高级消费性的行业,在城市中占领导地位”^[5]。在1949年底对上海城市人口的调查中,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人口中53%是依靠他人劳动的受赡养者^[6]。这里的受赡养人口包括学龄前儿童、在校学生、退休职工以及各类无业失业人员。1952年的调查中,受赡养人口更是高达62.4%^[7]。既然劳动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如此重要,因此,中共对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就是将其打造为“生产性”的城市。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组织群众生产,特别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各种赡养人口的组织。例如,对家庭妇女的生产组织。据统计,在工业生产方面,1949年前后的上海重工业行业中,女工仅有2800多人^[8]。截止1957年全市已有50万家庭妇女从事各项生产和工作^[9]。1958年11月上海仅徐汇区就有6000多妇女参加工厂炼钢^[10]。

简朴的生活弱化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劳动的普及提升了劳动崇高性的现实意义,两者有机统一,使得社会主义的幸福成为大众化且触手可及的存在。

最后,比较参照系减少或优势不复存在。客观地说,新政府所打造的幸福观是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然而这样一种价值观却获得了极高普及度,甚至得到群众的认同,这不是单纯的意识改造和行为规范可以达成的。

幸福是人类极为复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它不仅仅来自于满足感,有时,还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在探讨社会消极心理时,有学者引入了“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具体到幸福这一主题上,是指人们因心理参照系的比较,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幸福认知。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为中外交流的窗口区域。因此,上海民众在其生存序列中,不仅要

[1]《和女教师谈谈服装问题》,〔上海〕《文汇报》1955年7月7日。

[2]张明岛主编:《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3]李德全:《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北京〕《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第47页。

[4]《上海市一九五三年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总结》,上海市档案馆B242-1-535。

[5]《私营工商业应当力求改造》,〔北京〕《人民日报》1950年6月17日。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7]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8]《一年来劳动积极性更加高涨,50万妇女参加各项工作》,〔上海〕《新民晚报》1957年3月2日。

[9]《上海十多万家庭妇女跨出家庭参加生产》,〔上海〕《新民晚报》1958年12月2日。

[10]《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条件》,〔上海〕《文汇报》1958年11月5日。

面对来自于固有阶级、阶层以及内部贫富分化的比较参照系,同时更要承受来自西方物质文化传入而衍生出的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的对比冲击。

租界的广泛建立尽管是独立国家的耻辱,但现代化性却具有超越民族感情的独特魅力。上海开埠初期对入侵者的敌视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下被尘封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模仿、融入的冲动。在生活层面,人们的吃穿住行无不彰显着其对西方文化的膜拜,“时尚”、“摩登”、“洋气”这些充满着标识性意味的文化符号无处不在地宣示自身的存在。西装、洋装取代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面包、牛奶、咖啡一天天侵蚀着馒头、豆浆、茶的市场。西洋文艺形式诸如话剧、管弦乐队、芭蕾舞,体育运动诸如高尔夫球、网球、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赛马、棒垒球,逐渐将中国传统休闲娱乐形式挤入历史的角落。与此同时,拥有西式的文化标示就成为人们彰显自身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方式,也是幸福感的源泉。

上海解放后,租界回归和外侨撤离,中西存在及交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上海解放前,侨民中虽不乏社会边缘分子,但其整体处于社会上层,因此成为品质生活的代言人。解放后,侨民中的精英层严重流失,据统计,在解放初期留沪的外侨中有前外国驻华、驻沪使领馆人员及其眷属共129人,工商业资本家、企业经营负责人和商店主等工商业者共600余人,从事各种职业者(包括工人、职员、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独立劳动者、海员等等)共2000余人,宗教人员700余人。无业或从事非正当生涯者有二三千人。妇孺3700余人,学生904人(内大学生36人,中、小学生各400余人)^[1]。特别是美、英等国大批人员的撤走、离境,使得残存的外侨不再是一个精英齐集、令人艳羡的群体,西式的上流生活文化由是失去了存在意义。当“洋人”身份不再是“高雅”或者“上流”的对应体之后,西洋文化的物化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便不再是上海人追随的目标。

现有的西方物质文明日趋衰落,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外的隔绝状态。而仅有的物质文化输入也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一元化物质文明发展致使社会生活中的比较参照系迅速衰减,人们在大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鲜有心理参照系,大大降低其产生沮丧等不良情绪的概率。

三、结 语

幸福观作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其面貌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存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政权稳定的大局考虑,中国社会经历了7年的过渡时期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从本文的论述中可见,社会主义的幸福观形成却是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的。

从全新的社会主义幸福观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幸福观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环境适宜度的主观反映。首先,社会主义的幸福观构成了中共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幸福观的意识塑造中,有关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通过对幸福的重新定义,传递给上海民众;上海市民在接受新的幸福观念的同时,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认识、情感和价值观。其次,社会主义幸福观的形成过程中,顺应并满足着国家建设对社会意识改造的诉求。上海解放前,发展为消费主义至上的典型商业文化中心。解放后上海的经济凋敝,社会主义建设庞大的物质需求,都要求上海走上低消费、高积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全新的社会主义幸福观正是适应这种社会转型而演变的。最后,这种以勤俭为精神内核的社会主义幸福观还平抑了人们对幸福追求的物质主义取向。使得人们在生活水平大致平均的社会情境中,即使贫寒、辛苦,却也能轻易地感受幸福,催生了对社会主义和中共的政治认同,这是政权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责任编辑:肖 波]

[1]《上海外事志》编辑室编:《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